

观看城市的方式

□范宜如



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叙述旅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在荒野里驰骋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会渴望一座城市。”

可以说，我们是透过自己对建筑的想象去认识一座城市，而差异的存在，其实也确认了每座城市的独特性。诺伯舒兹曾说：“建筑意味着场所精神的形象化。”

时代的温度：当城市记忆变成建筑技艺

城市是个有机的身体，建筑造型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氛围。在这个强调物质感觉、标举个人特色的时代，网红打卡点的出现，无形中影响了人们观看建筑的方式。

这个时代强调跨界与创意，如何“跨”而有深度？如何“创”而不媚俗？则要看创作者的学养与自觉了。身为小说家同时也具备建筑师的身份，阮庆岳《开门见山色：文学与建筑相问》一书让实体的建筑与文学作品有了勾连。

王大闳曾在建筑设计之余，以十年之时间翻译并改写王尔德小说《格雷的画像》，这本书勾连了二者（不）可能的联结。然而，根据阮庆岳书中的叙述，王大闳的建筑创作，思考西方现代建筑与中国传统的建筑艺术，接轨的美学可能。

他以“孤独而不彷徨”对读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及安藤忠雄的建筑。安藤忠雄以最低限度的材料与形式创造出复杂而具有深度的空间，安藤强调外在世界与内隐空间自己的对立，人能在所处空间“看见原本看不到的东西”。

气度与视野交融的时间雕刻：王澐《造房子》

当代建筑师王澐的《造房子》是一本气韵生动，具备反思性的文集。透过10篇东方文化思索，3篇建筑设计手记，6篇散文随笔，1篇空间美学对话，可以看见他对于“兴造”的观点，进而审视我们对建筑以及空间的看法。

《造房子》这本书所关注的是人的感受，空间的物质性，建筑的空间叙事。透过观看与审视园林的兴造，看见空间理型的形成，看见空间范式的建构。他关切的是“家园”，是中国文化的意涵，以这种思维与态度，试图重启一种人与建筑融入自然事物的“齐物”观。

这个时代强调跨界与创意，如何“跨”而有深度？如何“创”而不媚俗？则要看创作者的学养与自觉了。身为小说家同时也具备建筑师的身份，阮庆岳《开门见山色：文学与建筑相问》一书让实体的建筑与文学作品有了勾连。

当代建筑师王澐的《造房子》是一本气韵生动，具备反思性的文集。这本书所关注的是人的感受，空间的物质性，建筑的空间叙事。透过观看与审视园林的兴造，看见空间理型的形成，看见空间范式的建构。

如，他谈造园，他谈缓慢，谈生活：“你看下雨，看很长时间，雨怎么下，从屋脊顺着哪条线流下来，滴到哪里去，它最后往哪个方向走。”在一切看似与建筑无关的事物上去谈人与城市的关系，恰可回应到他所谈的“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

他说：“建筑就是以空间的方式对生活这件事进行分类叙事。”也因此，在这本书会提出一些值得思辨的课题，譬如“一个人，需要多大的房子？”

我很喜欢他说的这句话：“我面对的一切都是当下的。我只想 让一个事物在一个世界中如其所是。”他不断强调，建筑要达成的是那种文化最好的状态和精神。

我们何曾思索过一栋房子的“生命”？在这个时代，我们怎样看待房子？这个大概如《小王子》书中所称的“大人”们，关切的是价格，而不是这个空间与自然形态的联系。

这本书有很多值得思量的观点，譬如“建筑就是以空间的方式对生活这件事进行分类叙事”，他所关切的是建筑如何成为一个“有独立生命的物”，书中说明了宁波博物馆的设计思想，在材料的择选方面，回收旧砖瓦进行循环建造。

建筑是一种思想，一种看见。看，必须“调动所有感官和智性”，毕竟人的身体，是被包裹在变化丰富的材料与触感之内。他引用利瓦伊史陀的话“所有文明的伟大之处，都在于其差异丰富的细节”。

有意思的是，他提到一个好的建筑的诞生，一开始要有很纯粹的、带着理想一样的想法。其次是长征，每次都人想摧毁你，否定你。必需百折不挠，而且要说服大家。

城市里，你的坐标在哪里？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人与人互动越紧密，疏离感反而越强。关于建筑与街道的书籍如此多元丰富，李清志《灵魂的场所》透过建筑的分类与导览，以孤独、思考、信仰、死亡、重新归零、探照心灵、和平为名，介绍了世界各地值得一个人独处的空间。

艾伦·狄波顿《幸福建筑》将建筑当作一个心理模型，每一种建筑样式，都是一种对幸福的理解，借此形塑独特的自我。一如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所说的：“地方是爱的记忆的所在”。

2022年8月10日，人文主义地理学之父、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在美国逝世，人文地理学传统最重要的学术关怀是“人类的关系”，而“如何创造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也是他终生追问的学术话题。本期特邀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范宜如、青年学者王璇，分享关于城市空间与文化场域的相关书籍。



城市空间与文化形象

□王璇



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是将地方与文化、想象力相连接，让地理学与更为广阔的学科知识进行结合。他让地理学回归了对人的重视，更指出经验、体验在地方感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文学地理学的起点，是将地理景观看作是“可解读的文本”，同时，文学作品里的地理景观也不只是现实空间的简单再现。正如麦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所说的，“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塑造了这些景观”。

作为美国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创始人，段义孚让地理学回归了对人的重视，指出经验、体验在地方感建构中的重要作用。而人的经验被放置于文本中，往往是通过对方地方、空间的建构实现对地方文化的表达与建构。

毋庸置疑的是，文学作品对空间的建构与解构成为现代中国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建立于空间的转换与流转之上：五四运动时期，新式知识分子与劳动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战争时期，人口大规模西迁、南迁；20世纪40年代后直至今日，更多的人离开散到海外……

但另一方面，这种对过去空间记忆的美化与建构，往往成为城市/乡村空间的经典形象与文化特质而被流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身处北京、青岛的沈从文，将文化理想寄寓于家乡湘西，要从传统文化与乡村文化生态的追索中“回到过去”。

这种以美化记忆、追忆历史作为重现空间、重构文化形象的方式，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台湾仍屡见不鲜。更重要的是，这对于七十年来共同记忆的塑造有着尤为突出的意义。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台湾作家有关北京、上海的空间书写和回忆文章层出不穷。

侯榕生则是从建筑、地貌方面描绘了令人怀念的古都空间。在《访古记》《北京城》等作品中，侯榕生追溯北京城市空间的发展历程，以真实的空间地景演展现了老北京的文化形象。在他们的作品中，东华门大街、什刹海、醇亲王府、地安门、庆和堂、故宫角楼、琼华岛、安贞门、崇仁门、齐化门这些真实的空间地景，全都成为表达乡愁的一种方式。

更重要的是，这些老北京城的地景成为一种历史坐标，标识他们回不去的故乡与离开的时间。这正是段义孚在《空间与地方》中所说的：“故乡有它的地标……这些可见的标志物可以使一个民族更有意义，它们可以提高地方意识和对于地方的忠诚度。”

无法填补离散的哀思。在这些“老北京”的推介下，北京城市的旧日风情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大放异彩。

曾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居北京的台湾作家，也在返台后写下大量追忆北京生活的文章。这些作品中对北京空间的重构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北京的海外文化形象。张深切笔下书写的北京形象，不仅投射了作者的抗争精神，也赋予了北京的城市形象复杂的文化特质。

总的来说，旅京台湾作家返台后对北京的追忆文章，向读者传达了丰富驳杂而立体的北京城市形象。这一文化形象的表达，对通过城市文化以重塑民族认同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表达北京城市空间的现代化形象，从而让北京成为参照，改变台湾本土部分观念的表达，让现代化追根溯源，与五四传统相连，进而达到了特殊的文化意义。

从这一维度上来说，对过去空间的文化形象塑造，对于城市空间的文化认同有着重要作用。作家林海音在作品中融入大量的北京城市元素，珠市口、椿树上二条、新帘子胡同、虎坊桥、西郊民巷、永光寺街、厂甸附小、师大附中等童年记忆中的空间，与味觉、嗅觉等感官记忆相连，将北京塑造成为温情脉脉的文化空间。这在上世纪台湾的种种巨变之中，展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空间形象，成为寄寓文化乡愁的一种载体而出现。这一表达将过去的北京塑造成为文化古都、新文化重镇且充满温情，改变了殖民时代的日本对大陆城市的负面宣传，进而建立起北京乃至祖国的正面形象。

在文化认同的塑造方面，城市建筑、地貌与空间的改变，能够较为直接地实现城市文化与国家认同的塑造。清代的台北曾以艋舺、大稻埕、城内三地为中心形成各不相连的地区，而在殖民时代则出于殖民者对空间权力的需要，台北被统合成为一个城市。台湾光复以后，改变殖民时代以日本街市命名的城市地景的做法，台北的街道改由大陆省府的名字命名，将台北街市地图变成中国地图，以空间地景的改变与大陆真实地名的耳濡目染来实现祖国认同的重铸。

不过，文艺作品对城市文化形象的传播有着更为广泛的作用。将现实的空间地景、城市建筑融入文艺创作中，进而使其成为城市文化形象的一部分，这一路径广泛见于有关台北城市空间的文艺创作中。音乐作品中出现的忠孝东路、101大楼、西门町、师大夜市、淡水河等真实街景，影视作品中采用朵儿咖啡馆、牯岭街、龙山寺等真实地名进行拍摄的地图，结合台北多雨的气候与夜市美食等等感官体验，全方位地塑造了台北的城市文化形象。加之朱天文、白先勇等作家的城市书写，让台北“文艺”“怀旧”的城市形象深入人心。由此可见之，城市的文化表达、文化形象传播有赖于文艺作品的助力。

这一路径也为城市文化形象的建立、传播提供了更多的思路。文艺作品中的空间塑造仅仅是创作者的文化表达吗？其对城市文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反作用？从传播学角度来看，虽然不同形式的文艺创作本身所携带的信息与特质不同，但任何媒介都有力量对实现不同程度的影响。城市形象的塑造既是创作者的自我投射，又以城市本身的空间地景、文化特质作为基底，那么城市空间的地景作为物质上的公共记忆，通过文艺创作的重塑、再造作为精神上的公共记忆得以广泛传播，为接受者补充物质空间没有呈现的种种留白，成为城市形象的经典文化名片。

这一文化名片同时通过人的经验反复印证、深化，进而强化人们对于城市的文化认同。由此，文艺创作所塑造的城市文化形象，通过主动参与城市空间的文化建构而成为城市文化名片的一部分。